

中國當前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^①

2020年10月，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，深入分析了中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，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，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，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。

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，如何理解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？立足“十四五”新起點，中國又該如何把握新機遇，創造發展新紅利？

外企不會主動放棄中國市場

首先，從中國國內情況來看，市場規模巨大，經濟潛能依然很大。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、最大的貿易國，擁有全球最龐大的14億人口，其中中等收入群體至少有4億人，相當於美國總人口，消費升級勢頭強烈。中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，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民眾對美好生活

^① 本文根據2020年10月香港《文匯報》對作者的專訪整理。

的需要，為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。

其次，從國際發展的大環境和大趨勢來看，世界經濟開放發展與經濟全球化仍然是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。西方的企業在中國投資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為了賺錢。資本是逐利的，中國市場的規模已經在逐步接近美國市場的規模。如此大的體量，沒有一家企業會主動放棄在這個市場中分得一杯羹。

中國已可主動創造“戰略機遇”

根據美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彼得森智庫的統計數據，過去兩年有 6 000 億美元流入中國。我和美國駐華商會交流，沒有一個企業想離開或自願離開中國。從歷史上看，是白宮聽華爾街的，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。

從國際機遇來說，過去中國是被動地接受了“戰略機遇”，即 gi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。隨着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體系中地位的上升，中國已經從被動轉向了主動。也就是說，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能力主動在世界舞台上為自己創造“戰略機遇”，而不是像從前那樣，經常受制於外部環境。只要中國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同時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，用更大力度的開放打造更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，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，就能為自己創造更多全球化紅利。

疫後“有限全球化”倒逼中國製造升級

“十四五”時期，中國經濟將進入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歷史攻關期，如何加快形成國內高端產業鏈佈局，盡快掌握“卡脖子”核心技術，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。疫後世界將進入“有限全球化”階段，從客觀上倒逼“中國製造”轉型升級，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。這也是在新的戰略機遇期裏危中尋機的題中之義。

儘管中國是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，什麼都能生產，而且生產量很大，但長期以來產業鏈偏低端，附加值低，不掌握關鍵的核心技術，因此，地緣政治一旦發生變動，就會受制於人。從現在開始，要加快形成國內高端產業鏈佈局，盡快掌握核心技術，擺脫對外部產業鏈環節的技術依賴，真正拿出更多整裝的“中國製造”產品。

外部壓力比內部壓力更有效

一個產品 99% 國產化，但 1% 的核心技術掌握在人家的手裏，還是不行。汽車工業發展那麼多年，原創性的東西有多少？我們的飛機發動機是別人的，航天領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別人的，這些東西中國是會做的，但是沒有壓力就做不出來。所以，來自外部的壓力比內部的壓力更有效。

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將深刻影響地緣政治。全球化不會停止，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“超級全球化”漸近尾聲，進入“有限全球化”階段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新佈局。目前有的國家已經開始把涉及

國家安全的技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裏，或者分散風險，盡量把產業鏈放在不同國家。從短期看，“有限全球化”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衝擊。但從長期看，中國將從“有限全球化”中獲益：一方面，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撤離；另一方面，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，而且國內市場廣闊，中國企業不僅可以佔領西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，還可以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。

政府市場協同，扶貧成效顯著

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實現了讓近 8 億人口擺脫絕對貧困，這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。中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作用，在強調社會二次分配的同時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，這一點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。下一步，在精準扶貧的基礎上，要控制相對貧困人口的數量。全球化的過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，但也帶來了所有國家財富差異的擴大以及貧困家庭的增加。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這幾年民主革命崛起，還有一些歐美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或者經濟民族主義。

西方調控經濟手段有限

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近 8 億人口脫貧，正是因為中國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加入全球化浪潮，這與西方國家貧困家庭增加的情況恰恰相反。為何會出現不同情形？

在歐美國家，資本主導一切，政府沒能在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方

面起到應有的作用。實際上到現在為止，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仍十分有限，一個是貨幣政策，另一個是財政政策。

而中國除了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，還有更多的調控手段。而且中國一直在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，這些企業對扶貧大有好處。當一個人失業了，光靠政府二次分配，很難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。而通過勞動所得，能夠實現社會發展與扶貧的雙贏。

要做好扶貧，需要發揮好市場與政府的作用。市場是做大餅的，政府是分大餅的，光強調政府“分大餅”，就會導致絕對平均主義。只有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，兩條腿走路，雙管齊下，扶貧才有希望。

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，暢通“內循環”關鍵

一定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穩定的根基。未來五年，中國需要特別重視培育、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，這關乎中國經濟擴大內需、推動內循環、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是否成功，也關乎中國能否避免落入泰國、菲律賓及拉美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。

一直以來，中國拉動經濟靠“三駕馬車”，但現在“三駕馬車”中，外貿受到疫情的巨大衝擊，基建在經歷過去多年的大規模投資後已經出現邊際作用遞減。要拉動經濟，主要靠消費，這就意味着要進一步減少貧困人口、壯大中等收入群體，使消費力得到更大釋放。

中國目前有 4 億左右的中等收入人口，大約佔總人口的 30%，與發達經濟體還有差距，但也意味着有巨大潛力。試想，如果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佔比也像美國那樣達到 50%，那就是有 7 億中等收入人

口，這得造就多大的市場？

未來五年，中國應該通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、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保障等手段壯大中等收入群體。改革開放之後，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，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確成長很快，但缺乏制度保障。今天的中等收入群體說不定明天會變成貧窮階層，小孩上學讓他們變成孩奴，買了房子變“房奴”，家人得個重病可能傾家蕩產，因為沒有保障。所以，要把社會建設做起來，把社會保障做起來。

提升“軟基建”，加強社會保障

中國這一輪發力的關鍵應當在於“軟基建”，通過發展醫療、公共衛生、教育、公共住房、醫院、老人院、都市停車場等加強社會保障。不解決“醫療、教育和住房”這三座新大山，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，中等收入群體就沒有制度基礎，也沒法激發消費力。培育中等收入群體，在未來三五年、十來年很關鍵，一旦經濟發展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，就可能做不起來了，因此事不宜遲。

保持雙循環至關重要^①

21 世紀頭十年，對於中國來說，無論內政還是外交，都是最好的時代。2001 年中國加入 WTO，那麼多年的經濟兩位數增長，都發生在加入 WTO 之後。

國家發展需要資本，沒有資本就很難運作，尤其是像中國這種大國。雖然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，但那時候進入中國的資本主要還是海外華僑以及中國香港、中國台灣的華人資本。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，真正意義的西方資本進入中國，這是中國加入 WTO 的重要動力。因為西方資本進入中國，中國產品要向西方輸送，需要接軌。加入 WTO 之後，中國就真正跟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了。

^① 本文根據 2020 年 8 月第 16 期《新週刊》對作者的專訪整理，原標題為《光喉門大沒用，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》。

全球化帶來了什麼？

21世紀頭十年，中國在很多領域獲得了快速發展。2010年，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。但到了第二個十年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

其實，變化在2007—2008年西方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時已經開始了。中國抵擋了經濟危機的衝擊，而西方開始感覺到自身體制存在問題。因為全球性經濟危機基本上是華爾街的危機，從金融危機演變為整體性的危機。

從“佔領華爾街”運動起，大家就開始反思：全球化跟經濟危機有什麼關係？它帶來了什麼？

從宏觀層面來看，各個國家都失去了經濟主權。到今天為止，沒有一個國家敢聲稱自己有經濟主權——包括中國，因為國與國之間互相依賴。

經濟的全球化、技術的全球化，導致政府稅收的消失、就業的消失，這不是美國一國的個例。美國一直說中國人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，而這當然不是中國的責任。因為生產資源在全球範圍通過市場分配，iPhone（蘋果手機）在美國產生不了多少工人階級，工人階級在珠江三角洲；而且，即使談“轉移”，目的地也可能是其他國家。

這一波全球化被稱為“超級全球化”（hyper-globalization），它跟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不一樣。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化，是基於主權經濟體制的全球化；這一波全球化則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的分配，美國很難把所有的東西拉回美國，這也是西方感覺到的危機。

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衰落

2008年的經濟危機也讓西方世界感覺到，中國變強大、變自信了。

如果說中國以前韜光養晦，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國學習，2008年以後，中國開始對西方有所懷疑：你怎麼搞的？怎麼還不如我搞得好的？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以及經濟民族主義做法，可以上溯到2008年，這是一個延續的過程，不是一下子跳出來的。

西方在經濟上至今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問題，在政治治理上又出現了很多新問題，加上中國變得更加強勢且自信，西方對自己的制度顯得信心不足。

“9·11”、“非典”（SARS）、經濟危機、特朗普上台、新冠肺炎疫情，這些看似偶發的事件，背後都有着大趨勢發展的必然。即使這些事件不出現，也會有類似的其他事件出現。“9·11”是恐怖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，“非典”和“新冠”本質上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產物。它們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是偶然的，但它們的發生是必然的。

特朗普上台更是如此。不是特朗普，另外一個人也會出來搞民粹主義。在歐洲，民粹主義早就抬頭了；至於美國，中產階層從二戰以後的70%下降到不到50%。中國是從窮到富，速度慢一點也可以接受，美國則是從富到窮，奧巴馬當總統8年，美國中產階層規模每年下降約一個百分點，全球化創造的財富，流到了少數人手裏。

這直接導致了西方反華浪潮和認同政治（identity politics）的興起，西方開始害怕中國的體系了。之後中國提出“中國製造2025”、“一帶一路”以及“中國模式”，這樣的輿論和做法也進一步加深了西

方的恐懼感。2008年，美國還是奧巴馬這樣的傳統精英當政，相對克制；特朗普一上台，他代表的保守勢力就全面崛起，大搞民粹主義，開始把矛頭指向中國。

保持雙循環至關重要

外部環境在變化，與此同時，對中國來說，儘管內需比重越來越大，外貿不再像20世紀90年代或21世紀頭十年佔那麼大比重，但外貿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。

保持對外經濟關係很重要，它不光是一個量的問題。過去我們常說美國製造、德國製造、日本製造，這些產品，比如當年從日本進口的相機、電視機等，都是整產品。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，全球化導致國際分工的出現。所以，當我們說中國成為“世界工廠”的時候，“全球化”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。

這波全球化，中國主要聚焦的是西方技術向中國的擴散和應用。我們是個應用大國，還不算一個創新大國，創新近些年才被重視。正因為中國是個應用大國，所以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影響很大。像華為，中國最好的科技企業之一，它相當比重的技術如芯片、操作系統仍依賴於外部供應，成為讓人頭疼的問題。

根據工信部部長苗圩的說法，美國是全球製造業的第一梯隊，日本、歐洲是第二梯隊，中國還處於第三梯隊。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相比，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但這些提高大部分基於西方技術的應用，自創能力仍然有限。對此，我們不能盲目驕傲，要有客觀估計。

一方面，我們要發展內需；另一方面，我們還要有外部循環。沒有外部循環，我們會再次封閉，逐漸落後。高層強調，我們要“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”，這一點我們要記住。我們的技術還處於下端，很長一段時間內，我們還應廣泛運用西方技術發展自身，因為西方技術也在不斷進步；同時，一定要進行自主創新。

21世紀以來，中國確實迎來了發展機遇，而這個機遇也已發揮到了頂點。如今，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創造、把握新機遇，實現持續崛起。

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在亞洲

我們看到，美國的衰落是一個長期過程。好多人說美國馬上就要衰落、解體，其實不然。無論是經濟實力、軍事力量還是技術創新，美國仍然很強大。

美國是一個危機感驅動的社會，有危機它就會有反應。現在美國面對的這波危機，遠遠比不上20世紀60年代的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。社會抗議、反叛，可以說是美國制度的一部分，它的容積足夠大，可以容納這些矛盾，所以，不要錯判美國。

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我們必須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問題，不能光看中美關係，否則就會犯錯誤。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的預測，到2024年，中國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，美國排第二，印度、日本、印度尼西亞則依次排第三到第五位。前五位有四個是亞洲國家，這說明，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在亞

洲，所有國家的重點都會放到亞洲。

在這樣一個局面下，中國不僅要跟美國競爭，跟印度、日本、印尼這些國家的競爭也會加劇。中國如何處理自己跟周邊這些經濟體的關係，就決定了中美關係的走向。中國絕對不要四面出擊，如果這些經濟體跟美國聯合起來，哪怕中國經濟總量最大，也沒用。

所以，看中國的未來要跳出中美關係。跟美國以外這些大經濟體的關係處理得好不好，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走向。

光噪門大沒用，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

事實上，中國與西方在經濟上的競爭並不是那麼強烈。中國的開放為西方帶來了多大的利益？在某些領域，中國已經接近甚至超越西方，但這些領域跟西方的競爭並不是很強；總體而言，中國的製造業仍落後於西方。而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，中國跟西方在經濟上是互補的，主要分歧仍在於認同政治，就是文化、意識形態、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。

其實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開始，中國一方面反對美蘇霸權，一方面也在尋找跟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共同利益。改革開放以後也一樣，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，不爭論。市場經濟只是一個工具，資本主義可以用，社會主義也可以用。不爭論就是不搞認同政治。

我們有不同，但我們也要求“同”。並不是說文明、文化、意識形態有差異就必然發生衝突。實際上，中國加入 WTO 後跟世界接軌，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跟世界趨同。但有的人漸漸不去講這些“同”，有時候即使是同，還一定要把它說成不同，比如一些自媒體或民間智

庫特別喜歡強調“我們不一樣，我們比你們好”，這就有問題了。

塑造認同很重要。中國應該跟世界交流，跟區域來往，盡量尋求共同利益。刻意追求不同，就是在妖魔化自己。我們跟人家都是一樣的人，只是有些微不同。比如我們用筷子，歐美人用刀叉，印度人用手抓，但一樣是吃東西。與此同時，亞洲（包括中國）有政治、經濟方面的實踐，有跟西方不同的地方，有自己的模式。我一直在主張，要放棄西方的那套概念和理論，回歸基本事實，回歸科學，回歸理性。

這個思路要用來形成社會科學理論知識體系，而不能用於宣傳。我們現在沒有這套知識體系，而是拿着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解釋自己。從美國拿一點，從英國拿一點，怎麼解釋得通呢？亞洲崛起得很快，但我們的人，尤其是知識界人士，還在受西方思想的殖民，這是最糟糕的。思想殖民產生的東西，就是加工和應用，缺乏吸引力，也解釋不了自己。

為什麼德國、法國的社科哲學互相吸引？因為它們基於事實建立了一套自給自足的理論體系，互相交流，這就是基本功。這跟趨同一點都不矛盾，越想跟別人趨同，越需要有自主理論原則，並不是照抄照搬就能跟人家趨同了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建立的自主經濟體系，跟世界接軌有矛盾嗎？沒有，正因為自主，所以接軌接得更好。

我們缺乏的是軟力量。各種媒體形式中國比哪個國家都做得好，噪門可以很大，但人家聽得進去嗎？人家聽不懂，因為你沒有自己的東西。西方的軟力量強大，在於它背後有一套龐大的知識體系支撐；我們有錢、有技術，但我們沒有這樣的思想基礎。建立這樣的社科思想體系，恐怕需要幾代人的努力。但沒有這個意識的話，我們永遠不能產生這樣的知識體系。